

陈建功 吴义勤 主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丛书

谁是继承人

——《红楼梦》小说艺术
现当代继承问题研究

计文君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贵在写实——人物

贵在写实——世界

家族史诗 诗情文脉

一树春风有两般——《传奇》与《红楼梦》

继承关系再分析

谁是继承人

——《红楼梦》小说艺术
现当代继承问题研究

计文君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是继承人:《红楼梦》小说艺术现当代继承问题研究/计文君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12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丛书)

ISBN 978-7-5039-5735-2

I. ①谁… II. ①计…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5499 号

谁是继承人

——《红楼梦》小说艺术现当代继承问题研究

著 者 计文君

责任编辑 斯 日

装帧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信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1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735-2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丛书』总序

陈建功 吴义勤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巴金先生倡议和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响应下，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于1985年正式成立的国家级文学馆，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学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期刊以及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本、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为文化的薪传和文学史的建构与研究提供服务。建馆20多年以来，经过一代代文学馆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成为集文学展览馆、文学图书馆、文学档案馆以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交流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学博物馆，并正朝着建成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中心、展览中心、交流中心和研究中心的目标迈进。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文学博物馆功能的定位和认识的误区以及研究人员和研究经费的不足，对这些宝贵资料的发掘、整理、研究与出版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对这些资料背后

潜藏的人文价值与精神价值还缺乏有效的总结与提炼，如何让这些宝贵的资料在当代社会人文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缺乏深刻的思考与认识。其实，这些年来关于博物馆的功能学术界有过很多有益的探讨，文物如果只是保管在库房里，“藏在深闺人未识”，它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就不能得到有效的体现，只有对它进行不断的研究、推广、介绍，文物才会不断地得到“增值”，文物的生命力才会延续下去。

正是出于强化文学馆研究功能与研究能力的考虑，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大量引进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硕士等高级专门研究人才的同时，还先后成立了研究部、学术委员会和中国当代文学年鉴中心等学术机构，并面向海内外聘请客座研究员进行合作研究，力求不断拓展和提升文学馆的学术内涵，不断推出有影响的学术成果。2010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的挖掘、整理、研究与出版”，正组织全馆的研究力量并联合相关高校和研究专构的专家学者对馆藏文物进行专门的研究。在继续推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丛书”的基础上，我们此次又正式推出“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丛书”。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全面展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研究力量与研究成果，以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回报社会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支持与厚爱。

是为序。

2012年春于北京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章 《红楼梦》与它的现当代“继承人” / 5

第一节 《红楼梦》：被建构的经典 / 5

第二节 继承人：形成悖论的名单 / 18

第三节 继承：作为一般文学资源和作为叙事范式 / 26

第二章 贵在写实——人物 / 42

第一节 似是而非 / 42

第二节 认识与启示 / 54

第三节 来源与去处 / 66

第三章 贵在写实——世界 / 85

第一节 叙事中的空间与时间 / 85

第二节 永远的世情 / 101

第四章 家族史诗 / 112

第一节 中国叙事选择家族 / 112

第二节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 121

第三节 史诗追求 / 140

第五章 诗情文脉 / 157

第一节 小说叙事的中国气质 / 157

第二节 互文性 / 173

第六章 结语 / 189

第一节 被继承人失落的“《红楼梦》范式” / 189

第二节 作为可能性的有效性 / 200

参考文献 / 211

附录：一树春风有两般

——《传奇》与《红楼梦》继承关系再分析 / 217

引言

单纯去追究现当代文学史上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是《红楼梦》的继承人，即使不能说毫无意义，至少也意义不大，基本属于一种学术上的消闲活动。

本书论者不是宝二爷那般有福的富贵闲人，汲汲于小说创作，有时昏天黑地，有时柳暗花明，竟也凡心偶炽，认真做起议论文章，选了这么一个“没谱”的题目。我无胆也无力去学术消闲，自然也不是要论证雪芹先生的文学香火绵延不绝。

中国现代文学肇始至今百余年，《红楼梦》诞生则近三百年，翻检“谁是继承人”的旧账，用意却在当下。全媒体时代之下的中国小说叙事，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影视取代了小说曾经的位置，成为满足人们叙事需要的最为主流的提供者。如果不久之后的中国人不再需要小说来提供故事和经验，那么小说存在下去的意义还能是什么？外在压力之外，小说叙事本身也存在着掌握现实的内在困难。小说所提供的人类经验，在中国今天的现实生活和个人的真实经验面前显得日渐单薄、苍白。作为艺术的小说叙事，已然如同前现代社会的各种手工业技艺，面临着式微甚至消亡的可能。所谓史可为鉴，我对《红楼梦》现当代继承问题的思考，始终伴随着对小说现实困境的焦虑。因此，本书观察和思考的指向，不仅仅是谱系梳理和理论建构，创作实践始终是思考的重要立足点。

以下是我观察的脉络：

《红楼梦》是在现当代文学时期成为中国叙事文学经典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在《红楼梦》经典化建构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但也是功过参半、影响深远的一步。一方面，“新文学”运动对于《红楼梦》

经典化的建构，开创了“肢解红楼为我所用”的先河，这种功利主义的继承思维自此滥觞。但也是“五四”这个历史性机遇，使《红楼梦》实现了文化身份的转变，作为具有和世界文学名著对话资格的少数中国古代小说，为现代青年、特别是文学青年重视，开始深刻影响处于准备阶段的中国现代作家队伍。也就是从“五四”开始，《红楼梦》就脱离一般的中国古典小说成为中国文学阅读的必选读本，影响读者的同时也影响作家，以特殊的典籍身份参与到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的现场。自“五四”以降，经由整个现代文学时期、“十七年”、“文革”、新时期直至21世纪，《红楼梦》在整个中国文学坐标系中的典籍地位不断升格，其影响覆盖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成为不可撼动的经典。

《红楼梦》小说艺术的现当代继承，折射出现当代小说叙事发展每个阶段中最主流的创作倾向和最突出的问题。《红楼梦》始终以某种吊诡的方式存在于中国文学的现场，一直通过作家、作品和文学批评发出声音。《红楼梦》的影响如同核辐射，有形影响不难察觉，无形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

以红学史和现当代文学史为依托，以研究者对于《红楼梦》小说艺术的现当代继承问题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我们可以梳理出两张构成“悖论”的继承人榜单，一张阵容庞大，《红楼梦》的现当代继承一脉千流；另一张甚为寥落，《红楼梦》俨然已是广陵绝响，这一“悖论”，其实只是站在不同角度描述了《红楼梦》小说艺术的现当代继承。作为一般性的文学资源，《红楼梦》小说艺术的继承的确一脉千流。但如果换个角度，我们把《红楼梦》当作一个有机的文学体系来看，整体性地继承《红楼梦》的作品，也的确是广陵绝响，尤其在现代以来的这百年间，很难找到真正的继承者。

基于这样的观察，本书没有采用此前研究者通常所使用的“作家资源分析”和“小说文本比对”的研究方法，而是尝试性地引入了体系化的“小说范式”概念，作为对《红楼梦》小说艺术现当代继承问题新的关照角度。“叙事范式”概念的引入，提供了一个整体性和本体性的角度。所谓整体性，是指将《红楼梦》作为一个艺术体系，整体性地进行认识，即使在进入分析时要予以拆解为各具体方面，但不能脱离整体性的框架，不能“肢解红楼为

我所用”。而本体性，是指小说本体。《红楼梦》的现当代继承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古代经典叙事文本的现代影响问题，事实也是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演进问题。可以说，研究《红楼梦》小说艺术的现当代继承问题，为我们思考中国小说叙事在百年来的嬗变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场域，使我们能够在本体论意义上，重新思考和认识中国的小说叙事艺术特有的内在规定性。

《红楼梦》是曹雪芹动用中国全部的精神遗产进行的伟大叙事尝试，它充分继承此前的中国叙事传统，同时以绝世的艺术创新能力，完成了这样一部“给世人换新耳目”的小说文本。《红楼梦》在叙事上的进步性得到很多学者的肯定，也有人称其为“超前性”，不少研究者在研究中将其“追认”为现实主义甚至现代主义小说，但通过分析论证我们会发现，《红楼梦》与这些“后来者”或“外来者”在小说观和修辞原则上有着巨大的分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红楼梦》事实上建立了一种属于中国的小说范式。

本书的论述，选择了创作方法、题材选择、叙事意图以及小说文本气质作为切入点。基于对现当代文学史的尊重和红学有益成果的汲取，这些方面落实到《红楼梦》小说艺术的现当代继承问题上，具体体现为“写实”问题、“家族叙事”和“史诗追求”，以及小说叙事中的“文化蕴藉”和“诗化倾向”。

作为一般文学资源，这三个方面是《红楼梦》小说艺术现当代继承的现实境况。同时，这三个方面涵盖了小说叙事的基本面。“写实”问题，引出的是创作方法，指向作品所依据的虚构叙事的根本原则；“家族史诗”叙事，反映出的不只是题材选择，更是作家切入世界的角度——历史时间和文化空间就此展开；而小说的文化、诗化倾向，是构成小说中国气派的非常有特色的修辞方式。这三个方面的分析，都将指向叙事范式这一体系的核心——小说观。

接下来，以上面三点作为论述的出发点，在叙事范式概念的帮助下，通过对《红楼梦》小说艺术现当代继承问题的具体分析，从一致性的继承中发现差异与分野，《红楼梦》与此后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显然归属于不同的小说范式，而《红楼梦》所禀赋的小说范式下的小说观对于中国小说叙事具有

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本书论证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兜售一种以《红楼梦》命名的叙事范式。人类叙事历史中出现的各种经典的叙事范式，虽然是理论建构，但对于小说创作发展的意义往往更大、更深远。文学研究者并不具备像伊甸园里的亚当一样可以给万物命名的权利，指着这部作品说是现实主义，指着那部作品说是后现代主义，或者是自己发明出某个“主义”。“范式”的确立，固然是一种命名，但更为本质的诉求，是对于某种文学价值和小说观的推崇，从而推动小说这种叙事艺术自身的发展。

《红楼梦》不需要 21 世纪的我们去为她争名分。本书之所以不避嫌疑地提出从范式的角度去认识《红楼梦》的小说艺术，首先是因为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小说叙事，需要自我命名的勇气和担当，本书的这种尝试虽然有几分自不量力，但再微不足道也是一种尝试和努力。更为重要的是，以“《红楼梦》范式”作为参照系，可以让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演进历程，沿波讨源地反省一下我们今天的小说观，是否失落或者忽视了某些原本应该珍惜的东西。这些思索和探索，也许对中国小说叙事寻求自己的未来具有启示性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章 《红楼梦》与它的现当代“继承人”

第一节 《红楼梦》：被建构的经典

一切的缘起，在于一部名为《红楼梦》的小说。

简单地称《红楼梦》为一部小说，在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中显得有些异样，因为通常在“小说”之前，最短的定语也要加上“伟大”两字，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中国小说家的圣经”、“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之作”之类的评价，不胜枚举，这些闪闪发光的描述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但却也都在说，《红楼梦》不只是一部小说，至少不是一部普通的小说。

诞生于18世纪的《红楼梦》，在其问世之后，虽然因其特有的文学品质而蒙读者青目，在小说叙事还未获得文化尊严的情况下，也被一些不逐流俗的士大夫目为“奇书”，甚至产生了戏谑“经学”的“红学”一说，但它并不具有日后所获得的特殊文化地位和巨大影响力。

《红楼梦》在它诞生的时候，并不是一部典籍，而只是一部略显异样些的小说。套用《资本论》中描述货币诞生的那句话：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金银，我们似乎可以说，《红楼梦》天然不是中国叙事文学的经典，而中国叙事文学的经典，天然《红楼梦》。如同金银作为贵金属的自然属性，使其成为货币诞生时的必然选择，但货币诞生的根本力量，却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扩大。《红楼梦》所具有的艺术品性，使其成为中

国叙事文学的经典，但《红楼梦》的经典化，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发展以及各种政治力量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等复杂因素形成的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一、现代文学的检选

小说在中国改变边缘化的命运，取代诗歌、散文成为最主流的文学文体，与中国在19世纪中叶之后遭遇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开启现代化进程是同步的。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报，其办报宗旨即为：“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更是全面阐述了小说革命的纲领，“欲新一国之国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明确将“小说界革命”作为新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小说界革命”和维新运动不过是更大、更彻底的变革的先声，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政体，“礼崩乐坏”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时期，“五四”新文学运动带着弑父式的反叛气质开始了对“旧文学”与“旧文化”的彻底清算。数千年的文学标准被颠覆，此前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都被重新估量价值，《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一批优秀的古典白话小说，进入了“五四”新文学健将们的视野，在他们重新厘定的文学坐标系里，这些白话小说从受人轻视的鄙俗文学小道的边缘位置，挪到了文学的中心，取代了一直为士大夫所重的诗、文等雅驯文体，成为文学正宗。其实，“神圣曹（雪芹）施（耐庵）”，是为了“土芥归（有光）、方（苞）”，一切都为了建设“新文学”的需要。

新文学运动家们提倡“白话文学”、“平民文学”、“人的文学”，而《红楼梦》因其特有的思想内蕴和艺术品质，在新的历史时间里被予以新的解读，从而为新的文学导向提供了合适的本土文本证据，于是在蔡元培、胡适、

^① 饮冰著：《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1902）年，引自陈平原、夏晓虹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鲁迅、陈独秀、周作人、俞平伯、钱玄同、傅斯年等新文学运动健将阐述文学革命观点时，《红楼梦》被高密度提及，就连对中国传统小说一贯苛刻的周作人，也对《红楼梦》网开一面，承认它是唯一算得上“平民文学”的作品。

《红楼梦》因为其“深刻而流丽的白话”而作为古代白话小说典范作品的身份，被确立为中国文学的正宗，成为即将展开的现代文学叙事的源头活水。但“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健将们对于《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又出现了评价极低的矛盾现象。

钱玄同作为新文学革命的健将之一，曾和陈独秀、胡适就如何认识《红楼》、《水浒》这样的旧小说，在《新青年》上有过专门的通信交流：

弟以为旧小说中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三书耳。^①

我以为不但《金瓶梅》流弊甚大，就是《红楼》、《水浒》，亦非青年所宜读。吾见青年读了《红楼》、《水浒》，不知其一为实写腐败之家庭，一为实写凶暴之政府，而乃自命为宝玉、武松，因此专务狎邪以为情，专务“拆梢”以为勇者甚多。^②

由此可见，钱玄同一方面肯定《红楼梦》的价值，一方面又对《红楼梦》的主题和主人公的理解有着巨大的偏差，对其价值判断的矛盾之处也让人瞠目。

与钱玄同观点类似的，还有傅斯年：

我们固不能说《红楼梦》、《水浒》不是文学，然亦不能成其为真有

① 钱玄同著：《致陈独秀》，1917年《新青年》第3卷第1号，引自严加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② 钱玄同著：《答胡适之》，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1号，引自严加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价值的文学，固不能不承认《红楼梦》、《水浒》的艺术，然亦断断乎不能不否认他们的主旨。艺术外无可取，就是我们应当排斥的文学。^①

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文化时空，我们很可能无法接受对《红楼梦》作出如此之低且不符合实际的评价。放回到“五四”新文学革命的现场，我们才能看清楚此类判断背后没被说出的东西。“新文学”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在一片空地上重建自己的文学“新世界”，《新青年》上这些关于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争论，其目的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评价《红楼梦》、《水浒传》，而是为自己的那个“文学新世界”描画蓝图，确立范本。虽然“新文学”运动家们两手空空，但在他们心中，其实已有范本，那就是在19世纪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欧美现实主义小说，在这些外国作品没有得到充分译介和阅读的情况下，“五四”新文学运动家们只能拿更为国人熟悉的旧说部来比画未来中国新小说的进深宽窄。

沈从文1931年在《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一文中分析文学革命以来中国小说创作情况时指出：

《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书，被胡适之提出，给了一种新的价值，使年青人用一种新的趣味来认识这类书。^②

此处“新的价值”，指的正是新文学提倡的价值：“平凡的亲切”、“真实易解”、“为人生的文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的价值”，是胡适之们“给”的。

刘半农在其《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中谈及小说创作的艺术借鉴时

① 傅斯年著：《白话与文学心理的改革》，胡适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引自闵虹编《百年红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

② 沈从文著：《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引自吴福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

说：“作白话小说，求其细腻，取法于《红楼》。”^①又在议论“小说家最大本领”时，将曹雪芹与欧美现代著名小说家相提并论，评说《红楼梦》，显然是推介“新”和“洋”的小说观念和创作原则的方便法门。

如吾国曹雪芹李伯元吴研人，英国之狄铿士萨克雷吉柏林史梯文生，法国之莫枯尔兄弟莫泊三，美国之欧亨利与马克吐温，其心思之细密，观察力之周至，直能将此世界此社会表面里面所具大小精粗一切事物，悉数吸至笔端，而造一人类的缩影。^②

“五四”新文学健将们，对《红楼梦》的评价不无矛盾之处，主要原因是当时他们关于中国现代小说的观念并不成熟。新文学的文学主张，是先于新文学创作实践而提出的，在“五四”心态之下，对于属于古代文学范畴的《红楼梦》的肯定不无权益和功利的色彩，故而出现了这样的矛盾。

“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口号比作品有力，还没有出现鲁迅先生所说的“真货色”。1920年末，《小说月报》作为重要的新文学阵地，开始以“写实主义”号令文学界，而新文学真正的大收获，却还要等到三四十年代才实现。唯一的例外是鲁迅，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里发端，也在鲁迅手里成熟，并且达到高峰，而对《红楼梦》迄今看来都未失去价值的发现和肯定，也是鲁迅做出来的。他认为《红楼梦》艺术价值的要点就在敢于“如实描写”，“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③鲁迅同时还为这一关于小说的创作原则的论述，提供了艺术品质极高的文本作为佐证，身体力行地树立起了中国小说现代化与民族化的成熟典范。

① 刘半农著：《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新青年》1917年第3卷，引自严加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8页。

② 刘半农著：《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新青年》1917年第3卷，引自严加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8页。

③ 鲁迅著：《清之人情小说》，《鲁迅全集》第九卷，引自张宝坤选编《名家解读〈红楼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胡适力图为传统文化寻求转机的“整理国故”，将杜威的实验主义与乾嘉学派的实证方法结合，以科学的精神来对传统文化“做些整理的功夫”。标志新红学诞生的《红楼梦考证》，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尝试”。比起胡适的“自叙传”的观点和索隐派的附会，新红学这场考证和论争本身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显然更大。以对待经书的形式，郑而重之地考据几本旧小说，这极大地提高了小说叙事的文化地位，使《红楼梦》的社会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1921年亚东书局出版了《红楼梦》新版本，由汪原放点读整理，参照西方出版的书籍版式，采用西式标点，这就是《红楼梦》传播史上影响深远的亚东本。亚东本《红楼梦》校勘严谨，印刷质量良好，尤其是对现代版式和标点的采用，使得读者在阅读接受上，甚至在作品内容的呈现效果上，都某种程度上跨越了“古代”与“现代”的藩篱。亚东本的出现成为《红楼梦》现代传播的标志性事件，出版后多次再版。从20世纪20年代的报章评论可知，“自从白话文兴盛以来，《红楼梦》一跃成了文坛上的上客”^①。据北京高等师范学院1922年以答卷形式向近千人所作的一次“民意调查”，以及1923年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所进行的一次“青年爱读书”的社会调查，《红楼梦》均名列榜首成为当时青年最喜爱的读物。^②

“五四”新文学运动在《红楼梦》经典化建构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但也是功过参半、影响深远的一步。一方面，“新文学”运动对于《红楼梦》经典化的建构，开创了“肢解红楼为我所用”的先河，这种功利主义的继承思维自此滥觞。此后对于《红楼梦》，无论是作家还是研究者，几乎人人揣着一把阐释的刀，来解《红楼梦》这头牛。大家只割合乎自己胃口的肉，名之曰“精华”，把剩下的皮骨称之为“糟粕”。但也是“五四”这个历史性机遇，使《红楼梦》实现了文化身份的转变，作为具有和世界文学名著对话

① 袁梨著：《红学之点滴》，《世界日报》1927年9月3日，引自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② 黎荔著：《〈红楼梦〉与五四新文学观建构》，《创新·社科论坛》2008年第4期，第126页。